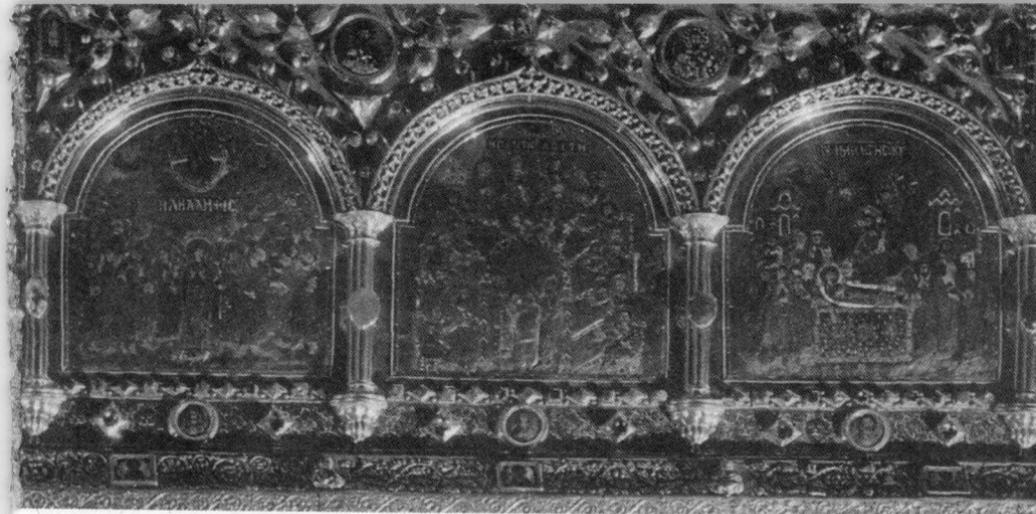


名著新译

[法] 左拉著 张成柱译

小酒店





# 名著新译

[法] 左拉著 张成柱译

# 小酒店



## 小 酒 店

〔法〕左拉 著 张成柱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1插页 310,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60-2465-7

I·2125 定价：20.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提 要

《小酒店》是法国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一部相当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小说以洗衣女工热尔韦斯和锌皮工古波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为主要线索，以真实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工人的悲惨境况。在贫困和失业的折磨下，这些穷苦的工人们只能借酒浇愁，而终日酗酒和不事生产，导致家庭关系恶劣，使男女杂居，无所不为，也使道德观念逐渐沦丧，最终只能走向羞辱和死亡。作品以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生动细腻地反映出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大批贫困手工业者的生活面貌，深刻地揭露了造成广大劳动人民悲剧命运的社会阴暗面。

## 译 序

左拉的《小酒店》是成功之作。从它在《公益报》上发表的那天起，就带着巨大的冲击力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有称赞和欢呼之声，也有抗议和禁止之声。后来这部小说竟重印几十次，把左拉推入法国著名作家的行列。那么，《小酒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作家大胆地运用了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

《小酒店》的写法不同凡响，写得真，写得细，写得深，写得自然。全书主要反映手工业者的生活面貌，在题材的选择上抓住一个锌皮工和一个洗衣女工，以他们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为主要线索，这是极自然的事。当时的穷困手工业者常常借酒浇愁，所以“小酒店”在作品中出现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俗话说，借酒浇愁愁更愁。酒给他们带来暂时的麻木与解脱，酒也给他们带来了疯狂与堕落，他们在酒中生，在酒中闹，又在酒中死亡。生不知如何生，死不知如何死，多么大的人生悲剧和社会悲剧啊！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想描写的是我们城郊的腐败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的不幸和衰败情况。酗酒和不事生产的结果，使家庭关系也十分恶劣，使男女杂居，无所不为，使道德的观念逐渐沦丧；到头来就是羞辱和死亡。”当时的批评家弗莱维勒也佐

证说,《小酒店》中的情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管作者笔下的画面多么丑恶,多么可怕,但只要是真实的,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那么,这部书就有它存在的价值。文艺作品的灵魂就是真实,弄虚作假的作品不会有任何价值,也不可能赢得读者。也许《小酒店》太真实了,很让一些正人君子们受不了。他们纷纷责难作者:为什么要描写这些污秽的、不堪入目的东西?为什么要揭露工人们的隐私?为什么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实质?有人甚至还说作者对民众仇视,说作品“散发着兽性的气味,是一种病态的性欲发泄”。就连雨果也说这是“一部坏书,作者恣意把穷苦人的苦难和卑污疮疤公诸于世。”我们认为:哪里有阴暗面,哪里就应该用文学形式来加以揭露。暴露文学不去暴露阴暗面,难道应该去暴露光明面吗?左拉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暴露这些创伤,使那些有责任医治这些创伤的人感到惭愧。”《小酒店》“是一幅可怕的图画,但它本身却包含了道德的意义。”社会丑只有通过较集中、较全面的揭露才能引起人们的憎恨,才能启发和感召人们来改变现实,变社会丑为社会美。

实际上,人民群众并不怕作家来暴露他们的阴暗面。《小酒店》首先得到一般平民的欢迎,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也知道,真实自然的杨白劳具有多么大的艺术魔力,而那个经过“革命”作家拼命“拔高”的杨白劳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和多么令人唾弃。雨果笔下的让·瓦尔让,被好心的作家粉饰得很高尚,成了处处帮助穷人的慈善家。可是这个人物并不受读者赏识,因为苦囚犯慈善家毕竟太少了,人们甚至怀疑这个人物是作家凭空捏造出来的。

在法国知名作家中,受到攻击最多的恐怕当属左拉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自然主义的理论。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左拉的文学主张。左拉曾气愤地反驳道:“他们强加

何实在意义。我们且不说从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所谓的“自然主义描写”，就是在某些现实主义作家整部作品的构思上，也不乏严重“失真”的弄虚作假。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们不是写出了许多部反映农民热火朝天，兴高采烈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长篇巨著吗？而今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又在哪里呢？这些作品哪有一点“真实”的影子呢？而左拉的《小酒店》和《萌芽》等作品，不管评论家们如何去评价它们，也不管批评家们将这些作品归入哪一类，一般读者是不管的，对他们来说，这些作品真实，有趣味，值得读，这就够了。

自然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在概括社会生活、安排故事情节和选择具体生活细节方面，都会出现失误现象。比如说某些作品基调低沉，人物和环境不够典型，作品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不够全面，甚至没有反映出生活的主流和事物的主旨；在细节选择上不够准确，不够典型，甚至完全失真。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写书的人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或自然主义作家，而在于他们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概括和再现能力；其次还在于他们具体选择的某一题材本身所能包容的最大容量。我们想强调的是：自然主义作家也就是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作家写出的作品不一定不好，现实主义作家写出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在法国，只有左拉等少数人称自己是自然主义作家；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称自己是自然主义作家。因为起码在我们的词典里，“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好字眼。

在我们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很难得出该作品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结论。假若《小酒店》是巴尔扎克写的，我们会怎么说呢？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同

于我们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个可鄙的责备，就是说，我们想单纯地做摄影师。我们已经声明过，我们承认艺术家必须具有个人的气质和自己的表现。但这声明没有效果，他们继续用这些愚蠢无力的论点来回答我们，说什么不可能有严格的真实，必须安排事实以产生任何一种艺术作品。”他还说，“我们必须修改自然，而又不背离自然。”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在完全自然地、绝对客观冷漠地、不加任何区别地临摹自然，那样就根本写不出小说来。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情书”。这“情”完全是作家赋予的。作家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变化的结果通过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用优美、和谐、传神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创作出让人爱看的艺术作品来。在这一点上，任何作家都是共同的。各种流派作家所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构思、取材和描写方面。现实主义作家所推崇的是“真实”二字，要求作品成为“如实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巴尔扎克要做法国历史的“书记”；福楼拜则提出“不要妖怪，不要英雄”，“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自然主义作家所要求的也是真实。左拉曾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使活生生的人物站立起来，在读者面前尽可能地演出人间的喜剧，作家的全部努力都是把想象藏在真实之下。”他还说：“故事愈是一般，便愈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请看，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主张在这里又是何等相似！

其实，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的区别仅仅表现在概念的语言形式上。我们的词典对“自然主义”向来没有好感，说它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说它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忽视或歪曲事物的本质等等。这种看法只是在玩弄字面上的概念游戏，没有任

样，在小说中某些章节的描写上，也常常难以分辨。比如《高老头》开头部分对伏盖公寓的介绍与描写，你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描绘，也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同样，《小酒店》开头部分假若出自于巴尔扎克或斯汤达之手，也许会被人称赞过“地道的现实主义勾画”呢。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左拉所说的“修改自然”，就是将人物和环境典型化。《小酒店》中的女主人公热尔韦斯就是在污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出现的一个由善良、正直、勤劳、热爱生活走向堕落与死亡的平民典型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自然主义”作家所能胜任得了的，只有极有水平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完成。热尔韦斯对人生的要求是：“能够安然地工作，常常有面包吃，有一个干净的地方睡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够了……呀！我也希望抚养我的孩子们，叫他们将来好好地做人，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还有一个心愿：假使我有一天和一个男人同居，我希望不被他打，是的，我不愿被人家打……这样就行了，您看，只这样就行了。”这是多么善良、多么实在、多么菲薄的人生要求啊！她不敢奢望，连人类五大需要中的高层次需要都不敢想，只要求其中最低层次的，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相属相爱的需要。这和中国武大郎的人生要求没什么区别。谁能说她不是个好人呢？可是，就连这最起码的需要社会也不给予她，一意把她驱赶进饥饿娼妇们的行列里，最后竟毫无心肝地将她逼进棺材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左拉笔下的热尔韦斯是一个成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像卖炊饼的武大郎一样，具有强烈的、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怎么能说左拉的作品没有反映出生活的主旨呢？怎么能说左拉“利用龌龊下流的作品对劳动者进行公开诽谤，为镇压者提供口实”呢？

不可否认，左拉的《小酒店》也是有不足之处的。这不足主要表现在作品中某些形象的创造缺乏真实感。尽管左拉口口声声要“真实”，要“忠于生活”，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他也时而表现出纯主观的、违背自然与现实的失控情感宣泄，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念来创造形象。比如书中的手工业者几乎全是酒徒，而且酒醉后都打老婆，而他们的老婆又几乎全都想偷汉子，这未免有点太绝对了。尤其是那个拉亚尔打起老婆来简直像凶神，一脚踢死老婆之后，便对他八岁的女儿拉丽大发淫威，不仅拳打脚踢，而且用皮鞭打，用烧红的铜钱烙，用绳子勒，最后竟将女儿活活折磨死，人们很难相信一个手工业工人会如此残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八岁的小拉丽竟充当了家里的“小妈妈”，养育弟妹，满口正经，甚至在被父亲打死前一瞬间，也不发一点怨言。退一万步讲，即使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物，那也不是很有代表性的，写进作品中未免有损于真实感和典型性，这些不能说不是作者的败笔。

人们当然可以指责左拉，但左拉作品中所出现的不真实描写恰恰是他概括修改自然不够，从而出现了“背离自然”的结果。这是他力不从心的表现，不是他故意要这么做的。他无意诬蔑工人，对小说的政治效果也许根本没有考虑。他只想写小说，写生活，从来没想去写鼓动工人阶级造反的《共产党宣言》，要求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做得面面俱到，显然是不现实的。某些搞文学评论的人，总爱片面地、主观地夸大小小说的政治功能和道德功能，动不动就给小说家扣上什么“丑化人民”，“淫秽不堪”以及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之类的帽子，这实在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存在，是现实主义的基础，现实主义则是自然主义的感情形式的反映与体现，是自然主义被

作家审美体验后的审美结果。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从自然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概括深化的过程，也是利用自然材料制造典型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只是表面定义上的区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要反映社会真实感的作家们，不管他们标榜是现实主义作家也好，是自然主义作家也好，都无一例外地做着从自然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升华工作。左拉式的“实验”与“修改自然”，也是巴尔扎克、福楼拜们经常使用的惯技。因此我们说，自然主义作家就是现实主义作家，两类作家的作品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要说有的话，则在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概括与再现生活的能力，说到底在于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与个性，在于他们社会认识力和洞察力的不断加深。就连法国评论家让·弗莱维勒也不得不说：“在《萌芽》中，现实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于矿工生活的真实的描写，使得左拉不得不给资本主义判罪。”这话如果让左拉来说，那想必会是：“《小酒店》和《萌芽》的成功，是自然主义取得了胜利。我对手工业工人和矿工生活的描写都是真实的。我在写《小酒店》时，就想到了给资本主义判罪，只是因为题材的不同，给资本主义所判的罪没有像《萌芽》中表现得那样明显罢了。”

作为文学艺术创作手法的自然主义描写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虽然严格地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人们时常混为一谈，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左拉等人虽然明确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但完全代表和体现这种主张的纯自然主义样板小说至今也没有发现一部，人们指责左拉等人的也只是局限在小说某某地方失真，某某地方不典型，某某段落是淫荡的性自然主义描写，某某段落是琐碎的，不反映事物本质的、强调个别现象的（如女人打架撕破裤头）自然主义描写等。说到底，又回到左拉的自然理论上，因为他的主张本来就和我

实主义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法国人在政治上爱创建新党，在文学上爱树立流派。自然主义的提法在当时颇显得别致。人们极有兴趣地注视这位自然主义的扛旗人如何实现他的理论。结果人们未免有些失望，除了挑出上述的一些缺点外，其余的和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没有什么不同。愤恨之余，人们甚至不想多看左拉对自然主义的解释了，只抓住“自然”二字进行攻击，这就是左拉愤怒驳斥被攻击为“单纯地做摄影师”的原因。

最后我们还想提及一点，那就是中国人最敏感的性描写。只要一涉及到性，就立刻被打上淫秽自然主义描写的“金印”。今天仍有一些人看不惯文学中的性描写。人类由男和女两部分人构成，人类的繁衍与发展、人类的欢乐与痛苦、人类的美感和情感都和性心理、性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把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怎么可以脱离性描写呢？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名著大都是性与人生的赞歌。一切禁止都无济于事，历代的文学作品还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性描写，有高尚的、伟大的、壮丽的、平庸的、低俗的、淫荡的、丑恶的、变态的等等。并不是作家随心所欲臆造了这么多种，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这么多种。我们可以批评作家对性描写所采用的角度、立场和态度，但不能否认所有的性描写。实际上，就连《红楼梦》和《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也有性描写，谁又能怀疑它们是优秀的小说呢？作家在描写性时，能够注意到社会效果，这自然就更好了。

译者

1996年4月7日于西安

## 原 序

《卢贡——马卡尔家族》包括20部长篇小说。远在1869年，这部巨著的总计划就确定下来了，而且，我极严格地恪守这一计划。该写《小酒店》时，我就写，像写其他小说时那样，一点也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写这本书给我增添了力量，因为我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小酒店》在报上发表时，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粗暴攻击和责难，简直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难道不是很有必要在这里用几行字来解释一下作者的意图吗？我想描写的是城郊污秽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必然衰败的情景。酗酒和无所事事，导致家庭关系松懈；而男女杂处的下流行为必然使正直情感逐渐沦丧，最终趋向耻辱与死亡。总之，这是正在产生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

《小酒店》的确是我写出的最纯洁的一本书。我常在其他书中触及到更可怕的伤痕。只是这本书的形式让人惊愕，人们对我的用词大动肝火。我的罪过无非是具有文学上的好奇心，将民众的语言收集起来，在一个很讲究的模子里进行铸造罢了。啊！形式成了弥天大罪！然而，俗语词典是存在的，文人们研究它，欣喜这类语言的活力、新颖与形象性。对于爱探索的语法学家来说，这种语言简直是美味佳肴。没有关系，谁也不会认为，我的志趣是做纯粹的语文工作，不会认为我对这种语言

只具有某种历史和社会性的浓厚兴趣。

况且，我并不打算自我辩解。我的作品会为我辩护。这是一部真实的作品，是第一部描写民众的小说，是具有人民气息的无谎言作品。我们不应该说整个平民都是坏的，因为我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坏人，他们只不过是在艰苦的工作和贫困的境况中变得无知与堕落罢了。在对我本人与作品作出滑稽、可恶的定论之前，应该看看我的小说，搞个明白，确实看清它们的总体倾向。啊！但愿大家明白，我的朋友们多么热衷于让众人开心的惊险传奇故事！但愿大家明白，我这个所谓嗜血成性的凶残小说家，是一个多么正直的平民，是一个多么酷爱研究工作和艺术的人，他规规矩矩生活在自己的角落里，只求尽量多留下一些生动的作品！我对任何无稽之谈都不屑一顾，我只是工作，相信时间和公众的诚意会从胡说八道中认清我的真面目。

埃弥尔·左拉

1887年1月1日于巴黎

# 1

热尔韦斯等待朗蒂埃，一直等到子夜过后2点。她穿着短上衣，在窗口的冷风中立了很久，浑身发抖，然后横倒在床上打瞌睡，焦躁不安，满脸泪痕。一周来，每当他们从“两头牛餐馆”吃过饭出来，他就让她回去同孩子们一起睡觉，他则直到深夜才回来，说是在寻找工作。这天晚上，她立在窗口窥视着他回来时，仿佛看见他走进了大阳台舞场，那里十个明亮的窗口射出的灯光铺展在外面黑魑魑的林荫大道上。她又仿佛看见，与他们同在一家餐馆吃饭的娇小的整光工阿代尔尾随着他，相距五六步远，她摇摆着胳膊，好像她不想在门前的强光下与他一起进门，也许刚刚离开被她挽起的手臂。

将近清晨5点光景，热尔韦斯醒来，浑身僵硬，腰酸背痛，放声呜咽起来。朗蒂埃没有回来。他第一次在外边过夜。她坐在床沿上，头顶是用绳子吊在天花板上的褪了色的被印花布床幔。她慢慢地用泪眼环视了一下寒伦的卧室，里面只有一张缺

了一个抽屉的核桃木五斗柜，三把带麦秸垫的椅子，一张油腻的小桌子，上面放一个缺了口的水壶。孩子们睡的一张铁床横在五斗柜前面，占了房间三分之二的地面。热尔韦斯和朗蒂埃共用的箱子在房角敞开着，看起来空荡荡的，只有些肮脏的衬衣和袜子，下面压着一顶旧男帽；墙边的椅背上搭着一条破了洞的披肩，一条沾满泥的裤子——连旧衣商也不肯要的东西。壁炉中央两个不配对的锌烛台之间，有一扎子粉红色当票。这里算是这家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了，位于二楼，而且窗子面向林荫大道。

两个孩子枕着同一个枕头，并排睡得正香。克洛德 8 岁，两只小手伸在被子外面，缓缓地呼吸，而仅有 4 岁的埃蒂纳一只胳膊搂住哥哥的脖子，熟睡着的小脸笑咪咪的。他们的母亲泪水汪汪地瞧着他们，又是一阵哽咽，她用手帕捂住嘴，堵住呜咽声。她赤着脚，忘了穿上从脚上掉下来的拖鞋，又去凭窗而望，又像夜里那样等待男人，远远望着人行道寻找。

这家旅店位于教堂大街，在贩鱼街的左边。旅店共有 3 层，是破旧的房子，墙上涂着酒糟红褐色，一直涂到 3 楼，百叶窗已被风雨侵蚀得腐朽了。门前吊着一个星形玻璃灯，灯上面的两窗之间可看到黄色粗体字招牌：“善心旅馆，店主：马苏利埃”，由于石灰墙发霉，有些字迹已经剥落。热尔韦斯用手帕捂着嘴，因为吊着的玻璃灯挡住了她的视线，所以她掂起脚尖。她往右望去，那里是罗什舒阿大街，一群群扎着带血围裙的屠夫们，停留在一个个屠宰场门前；清冷的风不时吹来腥臭的气味，那是被屠宰牲畜的气味。热尔韦斯又往左看看，瞥了一眼长带状的街道，将目光收在几乎是正对面的正在修建的白色拉里布瓦西埃医院上。她又慢慢地将目光移到入市税征收处的墙上；她有时夜里听到这面墙后有被暗杀人的叫声；她拿眼睛搜索偏僻

的或昏暗的角落，仔细看潮湿的、黑乎乎的垃圾堆，生怕在那些地方发现朗蒂埃肚子上被捅了刀的尸体。她抬起头，往围住这个市区的绵长灰墙之外的僻静环形地带望去时，看到了一股强光，太阳的光束已经充满了巴黎清晨的喧嚣声浪中。可是，她又把目光转向贩鱼街，伸着脖子，痴痴呆呆地望着从蒙巴特尔和教堂街走下来，穿行在税务所两座矮房中间的车水马龙。有时突然因堵塞使得人流与畜群停顿下来，涌上人行道；还有上班工人望不到头的长队，他们肩扛工具，胳膊下夹着面包；嘈杂的人群越来越多，继续淹没在巴黎的汪洋中。突然热尔韦斯自以为在这片人海中看到了朗蒂埃，她的身子往前倾得更厉害，险些坠下楼来。然后她把手帕更有力地贴在嘴上，好像要把她的痛苦堵进心里。

一个年轻人的快活声音使她离开窗口。

“老板不在家，朗蒂埃太太？”

“是的，古波先生，”她试图微笑着说。

此人是个白铁工，住顶楼 10 法郎的房间。他肩上挎着工具包，因为在门上发现了钥匙，就像朋友那样走了进来。

“你知道，”他继续说，“现在，我就在那家医院干活……嗨！多么美的五月！不过今天早上倒是冷飕飕的。”

他望着热尔韦斯哭红的脸。他见床上连被褥都没打开，便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他走到孩子们的床边，两个孩子仍在熟睡，脸像可爱的小天使一样鲜红。他压低声音说：

“喂！老板有点过分，是吗？……别生气，朗蒂埃太太。他很关心政治；那天大家选举那个好心的欧仁·苏时，他激动得像是发了疯。很可能他昨天夜里同朋友们在一起咒骂无耻的波拿巴。”

“不，不，”她吃力地低声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知道朗